

分析哲学的起源

[英] 迈克尔·达米特 著 王路 译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Michael Dummett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文出版社

分析哲学的起源

[英] 迈克尔·达米特 著 王路 译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Michael Dummett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哲学的起源/(英)达米特(Dummett, M.)著;
王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书名原文: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ISBN 978-7-5327-7111-0

I. ①分… II. ①达… ②王… III. ①分析哲学-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1116号

Michael Dummett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93

Copyright © 1993 by Michael Dummett

图字:09-2003-492号

分析哲学的起源

[英]迈克尔·达米特 著 王路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5 字数 150,000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978-7-5327-7111-0/B·414

定价:7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译者序

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的书我差不多都读过。也许是由于拜访过他、后来又与他通过信的缘故,我喜欢读他的书。而且读他的书,我总觉得是在听他说话,感到很亲切。

在达米特的书中,我读的第一本是《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这也是20几年来我读过多次的几本书之一。《分析哲学的起源》是达米特送给我的书,我只读过一遍。由于翻译,这次又非常认真地读了一遍。

达米特的书一般都很厚,也不容易读。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一个语言哲学讨论班上,一位教授讲述意义理论中的真之条件,谈了许多种观点,惟独不谈达米特。后来我与他专门讨论了达米特的观点,他回到课堂上说,达米特的思想很重要,但是达米特非常难读,于是就这样简单地把达米特一带而过。

达米特大概知道自己的书难读,也知道别人对自己的书难读的抱怨。但是他明确地说:“我不道歉。”他认为哲学家们低估了他们所处理的哲学问题的难度,而实际上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必须讲究方法。达米特所强调的方法就是分析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则是现代逻辑。

在达米特的书中,《分析哲学的起源》是最薄的一本,也是最容易读的一本。不过,从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达米特阐述哲学思想的风格与方法,而且还会看到他的一些独到见解。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做法是:详细分析胡塞尔和弗雷格的思想

历史背景,指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的共同所在,揭示他们思想的相似之处,通过分析他们各自思想的发展走向来说明,为什么从如此共同关注的问题,从如此相似的思想,最终会演变出完全不同的两种哲学。这样的分析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导致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而可以使我们加深了解,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根本差异是什么。我的体会是,看不到这些,所谓“打通”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大概是无法做到的。

国内学界不少人总希望能够“打通”中西哲学,而且也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肯定比“打通”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工作要难得多。我想,读一读达米特的书,对我们肯定是会有启示的:从事这样的工作,仅仅认为中国哲学是综合的,西方哲学是分析的,中国哲学是体验性的,西方哲学是理念性的,仅仅试图在一些术语概念上找到相似点,以使它们对应起来,如此等等,大概是远远不够的。

达米特的著作值得介绍,也值得重视。我希望,继《分析哲学的起源》之后,达米特的其他一些著作,特别是《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也可以译为中文出版。

感谢出版社为出版此书所做的努力!

王 路

2004年5月于清华

序

本书是 1987 年春季我在博洛尼亚大学所做一系列讲座的修改版。我遗憾地承认,这些讲座是用英语而不是用意大利语做的。我在写这些讲义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把它们变成一本书,或者甚至把它们发表。我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博洛尼亚大学的皮卡尔迪教授劝我发表它们。因此它们分两次连续发表在《语言与风格》杂志上。^①后来,舒尔特博士,也是一位多年的朋友,提议翻译它们,想把它们搞成一本小书。我欢迎这个想法。我本来没有想写一本书,即使我着手写一本**简要的**哲学书,我也绝写不出来。但是,出这样一本书的想法非常吸引我。舒尔特进行了无可挑剔的翻译,又加上了 1987 年 10 月他和我做的一个访谈文本。1988 年,这本书就以《分析哲学的起源》(*Ursprünge der analytischen Philosophie*)为名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后来在 1990 年有了由穆利诺出版社出版的皮卡尔迪翻译的意大利文本,题目是 *Alle origine della filosofia analitica*,没有这个访谈文本;1991 年有了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莱斯库雷的法文译本,题目是 *Les origines de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有这个访谈文本。借此机会,我感谢这三位译者对本常常没有得到充分欣赏的书的青睐,并成功地翻译了它。我还从未发表过任何翻译,但是有时候我做过一些翻译,出于我自己的兴趣和为了用于讲座或讨论班,我完全明白这是极其困难的工作。在我看来,译者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几乎从

vii

viii

未得到他们应得的赞誉。他们的名字只是以小号字出现,有时候甚至不在扉页出现。书评人除了埋怨,很少提到他们。然而,他们常常值得喝彩;这当然不仅适合于本书的三位译者,而且也适合于我的其他著作的译者。

这样,尽管可以得到这些讲座的英语文本,但是它尚未在一个说英语的国家发表,也未以书的形式发表。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用英语把它发表,但是我总想在发表前做一些修改,因为我确信一些部分需要改进。在1988—1989学年中我无法做这样的修改,当时我把一个休假年都用来撰写《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和《弗雷格的数学哲学》。在那以后直到今年10月,我主要忙于教学,无暇完成这项工作。现在退休了,我就能够做这件事情了。

ix 本书不是想成为一部史书。题目中缺少定冠词,就是为了表明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正如第一章所说明的那样,这是因为我想注意那些似乎在思想领域中起作用的因果影响,它们与谁读了些什么或听说些什么没有关系,但这也是因为本书没有企图包罗万象:我没有讨论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摩尔在分析哲学起源中的作用;实际上我也没有提到维也纳学派,更不用说实用主义者了。更确切地说,本书旨在对分析传统的根源进行一系列哲学反思,即思考任何真正历史作家都不得不考虑的一些意见看法,只要它们是正确的。我希望这样一种历史能够被撰写出来,它会是迷人的。但是我一直没有什么宏伟目标,而且我的书也比一部真正的历史可能会有的模样短得多。

本书形成目前的模样,是因为我在过去几年越来越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根源追溯到早在有这样一个学派以前。此外,这些

① 《语言与风格》,第23期,1988年,第3—49、171—210页(*Lingua e Stile*, Anno XXIII, 1988)。

根源与现象学学派的根源是**相同的**，而在许多人看来，现象学学派是分析哲学或他们眼中的“英美”哲学的对立面。我觉得，20世纪50年代开了一些无用的会议，英国分析哲学家和同样多的法国现象学家参加了这些会议，他们希望建立起交流。但是在我看来，这种交流更可能是产生于双方努力理解他们各自的哲学风格是如何起源于一些哲学家的工作，这些哲学家一度相互之间相当密切，而且肯定没有显示出建立不同学派的迹象。“英美”这个词是用词不当，而且损害极大。它不仅产生一种恶劣影响，鼓励那些会为其工作接受这一称号的人相信，除了英语，他们不需要阅读任何语言，更不用说用其他语言写作，而且还造成一种完全错误的有关分析哲学起源的印象。重要者如罗素和摩尔，都不是分析哲学的这个(the)源泉，或者甚至不是分析哲学的一个(a)源泉。而且实用主义也不过是一个流入分析传统主流的有趣的支流。分析哲学的源泉是一些主要或专门用德语写作的哲学家的著作；而且，如果不是由于纳粹制造的灾难驱逐如此之多讲德语的哲学家跨越大西洋，这种情况就会保持下来，并对每一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之所以认识到这一点，是由于我竭力地并且仍然非常不完整地回忆赖尔年轻时采取的步骤。赖尔的学术生涯最初是向英国听众解释胡塞尔，通常是讲波尔察诺、布伦坦诺、弗雷格、迈农和胡塞尔。非常遗憾的是，他对这些作者的认识几乎没有以文字保留下来，而且同样遗憾的是，据我所能认识到的，他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几乎没有在他后期著作中留存下来。在《心的概念》这部著作中，探讨得最不成功的、实际上几乎根本没有探讨的题目是意向性问题。^① 我对波尔察诺的兴趣是我研究弗

① 赖尔：《心的概念》(Ryle, G., *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1949)。

雷格的一个副产品,他在许多方面都显著地先于弗雷格。《弗雷格的数学哲学》一书的初稿有很长一段对波尔察诺与弗雷格的比较,而在我终于发表的简单得多的版本中,几乎没有保留这方面的任何内容。但是我对胡塞尔的兴趣却要归功于其他人:归功于戴维·贝尔,他写了一本关于胡塞尔的书,应该能够唤起英国哲学界对他的兴趣,^①而且首先归功于赫尔曼·菲利普斯。菲利普斯在1982或1983年访问了牛津大学,开讲座讲胡塞尔。1984年夏天,我冒昧地配合他,在牛津大学搞了一个关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的讨论班。^②我还从巴里·史密斯对《分析哲学的起源》(德文本)一书所写的批评性书评^③中,并且从弗勒斯达尔、莫汉蒂和其他许多人的论著中获益匪浅。

本书的一些段落与我的文章“思想与知觉:两位哲学创新者的观点”^④有一些重合。需要解释的是,在被邀请到博洛尼亚讲学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长度为一篇杂志论文的两倍。当我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用这篇文章做讲学的基础,增加了许多新材料,把它扩大为原来的三倍。在这一过程中,贝尔让我为他和库珀编辑的书写一篇文章。在解释了上述情况以后,我请求

① 贝尔:《胡塞尔》(Bell, D., *Husserl*, London and New York, 1990)。

② 参见菲利普斯:“意向性概念:胡塞尔从布伦坦诺时期到《逻辑研究》的发展”(Philippe, H.,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Husserl's Development from the Brentano Period to the Logical Investigations*, *Philosophy Research Archives*, Vol. XII, 1986—1987, pp. 293—328),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这个讨论班的贡献。

③ “论分析哲学的起源”(On the Origi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 Vol. 35, 1989, pp. 153—173)。

④ 载贝尔和库珀(编):《分析的传统:意义、思想和知识》(Bell, D./Cooper, N. (eds.), *The Analytic Tradition: Meaning, Thought and Knowledge*, Oxford, 1990);重印于达米特:《弗雷格与其他哲学家》(Dummett, M., *Frege and Other Philosophers*, Oxford, 1991)。

他允许我把原来那篇文章删减以后提交给他。贝尔同意了,我又回到原来那篇文章,这一回把它删到原来的一半。在这篇删减过的文章发表之前,贝尔使我接受了他的看法,即我对布伦坦诺的处理不太合适。因此我又扩展了那一节,进行了更细致的讨论。在本书的这一版中,我吸收了那篇文章中关于布伦坦诺所写的许多内容,但是未能比那时做得更好。

戴维·贝尔、约翰·斯科罗普斯基和其他一些人曾经一度合作过一个研究分析哲学起源的长期项目。我希望它最终会形成一本书,追溯理性历史上这一复杂事件的不同阶段。我相信,对这一事件的理解能够产生重大成果,增进人们对哲学问题的深刻洞见。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有助于填平以前开辟的“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不可思议的鸿沟,而近年来许多人都加入了沟通它们的工作。哲学没有一致的方法论,而且也很难有任何毋庸置疑的成就,因而哲学特别容易形成派别和宗派主义。但是这些东西只能对哲学有害。我也希望,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激励人们对哲学历史的兴趣,而我相信,这种兴趣是相互理解的一种先决条件。

在分析学派和现象学学派的冲突中,一个人只要把双方看作同样有错误,以此就可以是中立的。因此,几乎很难从一种中立的观点写这样一本书。本书是由一位分析哲学的实践者撰写的。尽管我一直关注的是说明这两个学派的创建者在20世纪初相互有多么密切,但是在他们发生分歧的地方,我也只能站在分析学派一边进行论证。如果有一本书涵盖同样的范围,又是从现象学的观点撰写的,它就会是一部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同样有分量的著作。我希望有人会写这样一本书。

达米特

1992年12月于牛津

目 录

- 001 序
- 001 第一章 思想家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
- 004 第二章 语言转向
- 015 第三章 真与意义
- 022 第四章 从心灵驱逐思想
- 028 第五章 布伦坦诺的遗产
- 044 第六章 胡塞尔关于意义的观点
- 060 第七章 没有所指的涵义
- 081 第八章 意向对象和唯心论
- 089 第九章 弗雷格论感知
- 104 第十章 把握思想
- 116 第十一章 胡塞尔论感知：意义的推广
- 128 第十二章 原始思想
- 134 第十三章 思想和语言

169	第十四章 结论：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个研究对象？
174	附录一 访谈
202	附录二 走访达米特教授
211	索引

第一章

思想家的历史和 思想的历史

对于分析哲学来说,十分重要的是理解自己的历史,即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一般哲学史的背景中审视自身:在它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的今天,尤其是这样。下面我要试图探索分析哲学的起源。但是这将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研究,原因有两个。 1

首先,我将不考虑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摩尔对分析哲学的诞生所做的贡献,而集中思考那些以德语写作的哲学家的有关贡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认为罗素和摩尔的贡献不具有深刻重要的意义,而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还因为,尽管罗素熟悉说德语的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弗雷格和迈农的著作,但是他和摩尔来自非常不同的哲学环境。人们习惯于把分析哲学说成是“英美”分析哲学,这种盛行的现代说法产生了一种对历史的严重曲解。这种说法除了含蓄地撇开现代斯堪的纳维亚哲学家的工作,也不考虑大量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新近产生出来的对分析哲学的兴趣以外,断然曲解了产生分析哲学的历史背景,而从这种历史背景来看,“英奥分析哲学”这种说法会比“英美分析哲学”更为合适。在中欧,也就是说,在这个以使用德语出版文献来定义的伟大的文化区,整个 19 世纪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哲学潮流。然而,这些潮流不是在孤 2

立的渠道里流动,而是相互冲击,因为大学中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一直在交流。在 20 世纪,不止一种潮流对分析哲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而在希特勒上台前,与其把分析哲学看作是一种英国现象,不如看作是一种中欧现象。如今人们看到科学和哲学的引力中心在美国业已形成,而且谁都认识到至少这种情况即将发生,但是,这种中心离开大西洋的转移却主要是政治事件即纳粹政权的长期影响:纳粹政权迫使许多人到美国避难。现在,这种转移的过程正由许多当代欧洲政府所完成,因为它们亲手对自己国家的大学体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然,这并没有使这种中心的转移成为不现实的,但是,把目前的现实设想为在过去一直是不可想像的,则是严重的错误。

我将只集中思考两种最终形成分析哲学的潮流之一。不仅如此,我将几乎根本不考虑尊重历史因果关系的问题。一种真正的历史研究必须提供一些哲学家对另一些哲学家发生影响的证据。为了确立这种证据,必须仔细查阅出版物的日期,研究日记和私人书信,甚至查阅图书馆目录,以便发现一些特定的哲学家读了些什么或可能会读些什么。对于所有这些,我将不予考虑。因此我的研究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研究,至少不是那种通常意义的历史研究。

思想史充满了无法以通常意义的历史研究所解释的发展。某人提出一种新的思想并以特定的论证支持它。但是不久,又有某人提出完全相同的思想并以十分相似的论证支持它。但是 3 他似乎没有机会阅读先于他提出这个思想的人的著作。或者,然而也更为引人注意的是,某人反对这种新思想,或提出反驳它的论证,尽管事实再次证明,他不知道实际上已经有人提出了这种思想。一如人们所说,思想是“空中楼阁”。恰当的解释很可能是,在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关于某个主题的思想逐渐呈现出

来,尽管只是呈现给那些具有敏锐思维洞见的人,而在更早的阶段,即使那些眼光最锐利的人也不能感觉到它。如果我们对思想的历史感兴趣,而不是对思想家的历史感兴趣,那么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些发展,而不是那些通过真正的历史研究过程所能发现的东西。无论如何,我所考虑的将是这些发展。我将论述各种不同哲学思想所引导的方向以及什么是从这些方向合理的发展,而不太花心思考虑谁读了谁的著作,或者 X 是从 Y 得到某个思想还是独立得到了这个思想。我不是在贬低真正的历史研究,它的作用是满足一类完全合理的好奇心。我只是进行一种不同的、尽管是相关的讨论。

第二章

语言转向

- 4 分析哲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而使它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是其相信:第一,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其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和美国以奎因和戴维森为代表的后卡尔纳普哲学,尽管相互区别很大,却都坚持这些相互交织的准则。在分析的传统中,最近有一些研究在解释的顺序上改变了语言对思想的优先性,因而认为只有以先前给定的不同类型的思想概念才能解释语言,而对这些思想的考虑则是独立于其语言表达的。加雷斯·埃文斯的遗著^①就是说明这种新趋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试图独立于语言说明,以各种不同方式考虑一个对象是什么意思,然后试图以这些思考对象的方式来解释造成指称它的不同语言手段。因此,根据我的说明,埃文斯不再是一个分析哲学家。确实,他显然是在分析哲学的传统上:他的著作所依赖的三个支柱是罗素、摩尔和弗雷格。然而,只是由于属于这个传统,即采取某种哲学风格并诉诸某些作家而不诉诸另一些作家,他才仍然是分析学派的成员。
- 5

因此,根据这种说明,分析哲学是在发生“语言转向”的时候诞生的。当然,并非任何一群哲学家在任何时候都会一致这样

看。但是据我所知,第一个清晰的例子出现在弗雷格 1884 年的《算术基础》^②中。在该书一个重要地方,弗雷格提出了康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有关于数的表象或直觉,我们怎么才能得到数呢?”他的回答依赖于备受赞誉的语境原则,这是他在导论中规定的该书所要遵循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之一。然而,语境原则被表述为是一条支配研究语言的原则,而不是一条研究思想方式的原则。如果它是以后一种方式被表述出来的,它就会说,除了在专门有关一个对象的某种思考过程中,根本不存在关于一个对象的思考。如果是这种情况,弗雷格就会回答康德这个问题说,我们通过把握有关数的全部思想而得到数。这样,他的研究就会是询问把握这样的思想涉及什么东西。然而,语境原则不是这样表述的,而是表述为如下论题:只有在句子的语境中一个词才有意义。因此他的研究采取的形式是问: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含有表示数的词的句子的涵义。一种认识论的研究(在它的背后有一种本体论的研究)是能够通过一种语言的研究来回答的。

《算术基础》并没有提供语言转向的正当性说明。它不过是被看作最自然的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式。然而,弗雷格随着其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坚定地认为,思想,而不是表达思想的句子,构成他真正的主题。自然语言在他看来终究是逻辑和哲学研究的障碍而不是引导。尤其是当他认识到他最终无法满意地解决罗素悖论,因而未能完成他自己一生所要完成的工作,即把数论

6

① 埃文斯:《所指的多样性》(G. Evans, *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ed. J. McDowell, Oxford, 1982)。

② 弗雷格:《算术基础》,德文和英文双语文本,奥斯汀译,第二版修改版,参见第 62 节(Gottlob Frege,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Breslau, 1884;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trans. Austin, J. L., Oxford, 1978)。